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文化经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



Zhongguo Xiadandangdai Wenxue

主编 李怡 千天全



清华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曹顺庆

#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主编 李怡 干天全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内容提要

本书内容包括绪论、尾篇计 21 章，系统讲述自 1917 年至 21 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概况及经典作品，共计五十万字左右。全书各章节由基础知识、经典阅读与知识延伸几个基本板块组成。全书精选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经典作品的精彩篇章，以对经典的导读、阐释为核心，以系统而简明、精当的文学史知识概述作为专业教育的基础，重点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与分析能力。

该书适用于大专院校文科专业师生及社会相关专业研究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怡，干天全主编.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0（2011.4 重印）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  
ISBN 978-7-5624-5438-0  
I .①中… II .①李… ②干… III .①现代文学—文  
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②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2865 号

## 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

###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主 编：李 怡 干天全

策划编辑：邱 慧 林佳木

责任编辑：邱 慧 版式设计：邱 慧

责任校对：任卓惠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编：[fzk@cqup.com.cn](mailto:fz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7.75 字数：527 千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 001—6 000

ISBN 978-7-5624-5438-0 定价：49.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 总序

这是一套以原典阅读为特点的新型教材，其编写基于我们较长时间的教改研究和教学实践。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几乎没有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羡林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以至钱钟书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诚然，钱钟书神话的形成，“钱学”（钱钟书研究）热的兴起，有着正面的意义，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悲哀：偌大一个中国，两千多万在校大学生，当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到人来承续其学术香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首当其冲应该拷问的是我们的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我们的学生学术基础不扎实，后续发展乏力。仅就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而言，问题可总结为四个字：多、空、旧、窄。

所谓“多”是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类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与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也有不少重复，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现代汉语”等还与中学重复。于是只能陷入课程越设越多，专业越分越窄，讲授越来越空，学生基础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就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原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少年，仍没有读过一本原文版的经典名著。所以，我们认为对高校中文课程进行“消肿”，适当减少课程门类、减少课时，让学生多有一些阅读作品的时间，是我们进行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和当务之急。

所谓“空”，即我们现在的课程大而化之的“概论”“通论”太多，具体的“导读”较少，导致学生只看“论”，只读文学史以应付考试，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针对这种“空洞”现象，我们建议增开中国古代原典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课程，减少文学史课时。教材内容应该更加精炼，集中讲授；应倡导启发式教育，让学

生自己去读原著，读作品。在规定的学生成绩基础上，老师可采取各种方法检查学生读原著（作品）情况，如抽查、课堂讨论、写读书报告等。这样既可养成学生的自学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又可改变老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育方式。

所谓“旧”，指课程内容陈旧。多年来，我们教材老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例如，现在许多大学所用的教材，包括一些新编教材，还是多年前的老一套体系。陈旧的教材体系，造成了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不可避免的陈旧，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 1950 年代以来，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平的“大师”。现在，专业过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拓宽专业口径，加强素质教育，正在成为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文化素质教育。我们相信，只要是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不但适应面广，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

纵览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凡学术大师必具备极其厚实的基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贯中，也不知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和西方的东西，而是学的方式不对。《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但这种学习基本上是走了样的。因为今天的教育，多半是由老师“导读”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等内容，而不是由真正阅读文本；另外，所用的读本基本是“古文今译”的方式，而并非让学生直接进入原典文本，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走样变味，不复是文学原典了。诚然，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甚至有人提出，古文今译而古文亡，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了，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更不幸的是，我们有些中青年学者，自己没有真正地从原文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或“诸子集成”，却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这是很糟的事情，是造成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的原因之一。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你要首先了解它，知晓它，否则你从何批判呢？“告诸往而知来者”，“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

我们在“贯西”上又做得如何呢？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学生们读的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我并非说不能参照译文来研

## 总 序

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和参照原文），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厚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著作。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这种不读原文（包括古文与外文）的风气，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严重衰减。

基于以上形势和判断，我们在承担了“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原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的教改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原典阅读”和夯实基础，组织了一批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著名学者、学术骨干，为培养高素质的中文学科人才，群策群力，编写了这套新型教材。这套教材特色鲜明，立意高远，希望能够秉承百年名校的传统，再续严谨学风，为培养新一代基础扎实、融汇中西的创新型人才而贡献绵薄之力。

本教材第一批共九部，分别由各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他们是：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社科委员、985 创新平台首席专家项楚教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曹顺庆教授；原伦敦大学教授、现任四川大学符号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教授；以及周裕锴、谢谦、刘亚丁、俞理明、雷汉卿、张勇（子开）、李怡、杨文全等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部教材主编如下：

《西方文化》曹顺庆

《中国古代文学》周裕锴 刘黎明

《古典文献学》项楚 张子开

《古代汉语》俞理明 雷汉卿

《外国文学》刘亚丁 邱晓林

《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怡 千天全

《语言学概论》刘颖

《现代汉语》杨文全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赵毅衡 傅其林 张怡

曹顺庆

2010 年春于蓉城

# 目 录

绪论.....	1
---------	---

## 第一编 运动中的新文学（1917—1927）

导引.....	9
第一章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	13
第一节 鲁迅的人生与文学.....	13
第二节 鲁迅的小说.....	14
第三节 鲁迅的散文.....	22
第四节 鲁迅的杂文.....	25
第二章 白话新诗的创立发展与郭沫若.....	30
第一节 白话新诗的创立发展.....	30
第二节 郭沫若的《女神》及其他诗歌.....	37
第三节 前期新月派诗歌.....	44
第四节 早期象征主义诗歌.....	50
第五节 其他诗人的创作.....	55
第三章 现代小说的新探索.....	60
第一节 社会问题小说.....	60
第二节 自叙传抒情小说.....	66
第三节 乡土小说.....	71
第四章 现代散文的新貌.....	77
第一节 《新青年》作家散文.....	77
第二节 “文研会”作家散文.....	82
第三节 创造社作家散文.....	87

第四节 新月社作家散文 .....	92
第五章 现代话剧的萌芽 .....	97
第一节 社会问题剧与早期写实戏剧 .....	97
第二节 创造社戏剧与中国现代话剧的抒情传统 .....	104

## 第二编 革命的文学（1927—1937）

导引 .....	113
第六章 革命文学时代的小说 .....	116
第一节 茅盾与巴金的小说 .....	116
第二节 老舍与沈从文的小说 .....	128
第三节 左翼作家与东北作家群的小说 .....	141
第四节 新感觉派及其他作家小说 .....	145
第七章 左翼文学运动时期的诗歌 .....	154
第一节 中国诗歌会诗人群 .....	154
第二节 后期新月诗派 .....	162
第三节 现代诗派 .....	166
第八章 左翼文学运动时期的散文 .....	174
第一节 小品散文 .....	174
第二节 报告文学与其他散文 .....	180
第九章 革命文学时代的戏剧创作 .....	191
第一节 曹禺的戏剧创作 .....	191
第二节 左翼戏剧和广场戏剧 .....	200

## 第三编 战争格局中的文学（1937—1949）

导引 .....	208
第十章 战争时代的小说 .....	211
第一节 张爱玲与李劫人的小说 .....	211
第二节 赵树理小说 .....	222
第三节 其他小说 .....	229

## 目 录

第十一章 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 .....	232
第一节 艾青、田间与七月诗派 .....	232
第二节 穆旦与中国新诗派 .....	240
第三节 其他诗歌创作 .....	246
第十二章 战争时代的散文 .....	248
第一节 蓬勃发展的散文 .....	248
第二节 鲁迅风格的杂文 .....	254
第十三章 战争时代的话剧 .....	260
第一节 历史剧的中兴 .....	260
第二节 大后方话剧的多重奏 .....	267
第三节 解放区戏剧及其他 .....	271

## 第四编 当代文学的转折（1949—1976）

导引 .....	276
第十四章 转折时期的小说创作 .....	280
第一节 茹志鹃和她的《百合花》 .....	281
第二节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	289
第十五章 转折时期的诗歌创作 .....	293
第一节 郭小川与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 .....	293
第二节 李瑛和闻捷的生活抒情诗 .....	299
第三节 “新民歌”与“天安门诗歌” .....	303
第十六章 转折时期的散文创作 .....	308
第一节 杨朔的散文 .....	308
第二节 秦牧的散文 .....	313
第三节 刘白羽的散文 .....	317
第十七章 转折时期的话剧创作 .....	322
第一节 郭沫若的《蔡文姬》 .....	322
第二节 田汉的《关汉卿》 .....	326
第三节 老舍的《茶馆》 .....	330

## 第五编 当代文学的启蒙时代（1977—1989）

导引	336
第十八章 新启蒙时代的小说创作	339
第一节 王蒙的小说创作	339
第二节 张贤亮的小说创作	344
第十九章 新启蒙时代的诗歌创作	353
第一节 归来的歌：艾青、曾卓和唐湜	353
第二节 “朦胧诗”：北岛和顾城	358
第三节 “第三代”：韩东、于坚和海子	363
第二十章 新启蒙时代的散文、报告文学创作	369
第一节 巴金的散文《怀念萧珊》	369
第二节 杨绛与《干校六记》	373
第三节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377
第二十一章 新启蒙时代的话剧创作	383
第一节 现实主义话剧的深化	383
第二节 现代主义话剧的探索	389
尾篇 市场经济与新世纪的到来	396
第一节 市场化时代的中国文学	396
第二节 陈忠实与中国小说的繁复状态	399
第三节 分歧与喧闹中的诗歌	405
第四节 市场化时代的散文创作	410
第五节 市场化时代的话剧创作	416
推荐阅读书目	422
后记	428

# 绪 论

呈现在诸位面前的是一些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同仁们的文学史新著。之所以称为“新”，乃是因为这样的命题、构架和写作方式都力图在目前繁盛的文学史著作中有新意，有突破，有建树。这些新的设计大概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文学史可以怎样进入？是否有把握文学史的新思路？

—

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包含了诸多至今也无法完全回答的困惑，产生这些困惑的不仅有刚刚进入文学史学习的学子，也有从事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多年的教师与学者。

一般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开端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所包括的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讲述被公认为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史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编纂的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还包括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1953初版）、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1980）、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初版）、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002初版），等等。这些文学史的写法各有不同，但伴随着中国现当代学术的演进，也大体可以现出一些基本的走向和趋势，其中最隐约浮动的线索似乎是：思潮运动史——政治革命史+作家座次——社会文化与体制史。这正好应和了中国现当代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嬗变过程：从将文学置于思潮斗争到附缀于政治革命的历程，从对作家座次的排定到更大范围的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制度史的研究。到今天，我们的文学史课堂教育与教学测评已经将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还有就是对作家所在社团流派、文学思潮、历史意义的反复考核上。

这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却同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最严峻的现实在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实际上成为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

“知识结构”，这里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最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很多，许多的思路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大大拓宽了我们既有的研究空间，例如关于“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的讨论，除了跳出那些机械的政治比附之外，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一般作家作品的分析阐述，而是努力将文学的发生发展引入到一些更加广阔的领域当中，例如文学史如何进入思想史，文学史如何丰富自己的思潮史，文学史如何完善自己的区域史，文学史又如何结合制度史，等等。我充分肯定这些思路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如果回到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事实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一部中国文学的演进的历史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就没有新文学革命，没有左翼文化思想的渗透成长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巨大分野，而没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更不会有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根本转变；文学的历史本身也由种种的思潮流派所构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不管你是否承认，它们的确极大地吸引着中国作家的目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中国诗歌会、左联、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西南联大作家群、京派与海派，无疑就是中国作家忙碌事务中的重要部分，我们自有“说清楚”的必要；同样，区域文化之于文学面貌的深刻烙印也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东北黑土地文化养育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与江南水乡的才子文人显然有如此明显的个性差异，同样居于南方文化圈，巴蜀知识分子也与南粤文人迥然有别，甚至也与湖南作家群不同，这里可供我们探讨的“故事”显然很多；至于文学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在今天也几乎成为了热门话题，现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形态都直接关乎中国文人的生存和写作，因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影响文学发展的基本“因素”，中国文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本身的表现，许多许多的社会力量都试图争夺这一精神领域，努力在其中打下自己的印记，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

然而，我们的困惑在于：仅仅抓住以上这些影响文学发展的“力量”就等于进入了文学的现象了吗？文学史的书写就等于是以上这些社会文化因素的汇合吗？恐怕不能这样认为，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抛弃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最基本的存在——文学作品。我们需要对文学周边的诸多力量加以分析认识——包括思想、社群、体制、文化，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认识都最终是因为出现了独特的“文学作品”才发生了“意义”，文学作品可以承受这些“文学周边”的影响，但是只有文学作品的事实上的存在，才最终形成了代代相继的所谓文学的“历史”，文学作品不断变化所形成的“效果”（史）可以包含思想史的烙印，也自然与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种种的联系，一个作家（作为某一社群的成员）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他的精神创造，所有这一切最终能够加以证明并被研究者挖掘和阐述的只有一个最可靠的依据——

文学的产品，如果我们失去了文学的作品，所有这些或宏大或精微的理论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就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反过来想，在一些历史背景“晦暗不明”的时期，还有没有文学史呢？有没有值得书写的文学的故事呢？那也不取决于历史背景本身而决定于能否找到属于那个时期的独特的文学作品，例如莎士比亚，今天的“莎学”研究在莎士比亚本人的身世问题上遭遇了太多难解之谜，但所有这些无法确定的“文学周边”的内容似乎并没有影响莎士比亚文学的伟大价值，也丝毫没有影响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学史重要章节的事实。这也就告诉我们，在一种“极端”的情形之下，决定文学史根本的不是“文学的周边”而是文学作品本身。

文学作品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史不能也无法凌驾于这一文学现象之上。这本来是最基本的常识，然而今天的问题却是：中国的学校教育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这一基本常识。小学生在没有读过鲁迅作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他如何“弃医从文”，如何“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脱离了文学感性的鲁迅由此被注定了脱离青少年需要的不幸命运；大学生在根本没有系统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候却首先信息量巨大地知道了社团、流派与思潮；研究生呢，则在没有多少文学阅读经验的前提下匆忙展开着自己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建构！这样的文学史教育只能是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所谓的文学史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教育体制架空了，架空于一切基本的文学现象之上，架空成为自说自话的“理论的演绎”。一个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传输，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教育的现状与知识增长的现状：人们已经习惯于脱离具体的文学事实来接受精英知识分子的“结论”，并把这样的结论当作毋庸质疑的“知识”。久而久之，我们在不断接受“文学史”教育的同时在事实上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文学”。

文学史，本来就是文学作品的意义讲述以及我们对这些意义生成奥秘的一种解释。

## 二

以上的困惑来自我们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实践，我们一直在探讨这样的一种可能：如何让文学史的教与学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

本书就是这一设想的第一次尝试。我们的总体构思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典的学习始终放在文学史讲述的核心地位，其他知识性的部分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学原典的出现和独立价值。

这样的文学史学习，把个人鉴赏能力的培养和发掘置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学生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获得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现象的独特的领悟，是衡量我们教学成效的基本尺度。这里，最需要辨明的便是当前盛行一时的各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尤其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理论与批评）在我们学习中的地位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有“现代”之谓，题中之意乃是它具有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新的特征。理所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应当创造和使用与这些新特征相适应的新的概念系统和阐释框架。然而，回首已经过去的一百年，我们目睹了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目睹了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迷醉于“现代”之途的种种坎坷颠簸。开放与引进，似乎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姿态。于是，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纷至沓来，现代的中国成了外来理论的实验场，一时间，能否不断追随西方，“与时俱进”，在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评家、理论家的无形的标准。1980年代中国文学思想界讨论“主体性”问题，而所谓的主体性问题在当时几乎成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主体性问题其实根本没有同西方文学经验问题区别开来。当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和概念被广泛引入中国，并成为我们的基本概念之时，我们实际上又陷入到了另外一层新的困惑：这些外来的概念能否完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学经验？鲁迅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巴金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文学理念？甚至屈原的楚辞可以名为“浪漫主义”，而《诗经》可以名为“现实主义”？

可能正是这样的困惑促使了另外一种选择的出现，这就是“民族化”，即重新回到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缅怀与追忆当中。这固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问题却在于，“民族化”和“传统性”的生成一旦被置于与“现代化”和“西方性”相对立的立场，那么这一命题所能够包含的空间也就十分的狭小了。在被切断了与当代生存的有机联系之后，它事实上只能是既往的一套已经成型的思路与概念的运用而已。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兴”、“味”、“风骨”之类的话语在今天的生命力，但是作为现代生活映射的文学毕竟还有属于今天的新内涵，离开了“现代化”，离开了对“西方性”丰富内容的把握与参照，我们依然很难描述我们的文学现象，我们也很难产生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1990年代的“民族化”设想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的困难。

关乎个人鉴赏能力的文学感受的问题就这样被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对于文学史的理解而言，重要的不是已经存在过的中外文论遗产，而是一个当下的人如何准确地发掘自己的文学感受，从而准确体会中国现当代作家创造秘密的问题。只有我们自己的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才是通往中国现当代精神殿堂的唯一桥梁。也只有我们自己的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才能最后生成与现代中国艺术体验相适应的、现代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式。

## 三

如何提高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典的感受力与鉴赏力呢？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就是不能仅仅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当作客观的“知识”，而必须努力从个人人生体验的角度寻找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追求的内在沟通，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将文学中的人生社会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人的人生问题史，阅读文学，就是理解这些我们或许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问题，认识和展开这些问题在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增加与我们无关的“知识”，而是让我们学会读懂人生，体察生命，获得智慧。

我们曾经有过文学直接回应人生问题，而人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的时代，这就是“五四”与1980年代。在那些热闹而激动人心的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乎就是无数青年学生生存关注的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动向似乎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精英的动向，而这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则引领和规划着青年的未来。“立人”的鲁迅，“天狗”般呐喊奔突的郭沫若，“爱心”的冰心，“问题小说”的青年们，“情与爱”的徐志摩；还有《班主任》、《伤痕》、《人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朦胧诗、政论式报告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每一次律动都仿佛是中国青年自己的心跳。那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学科知识”，而是自我人生追求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鲁迅之所以并不遥远，之所以不会被大多数的青年学生挑剔“爱国问题”、“家庭婚姻问题”乃至“艺术才能问题”，是因为他关于“立人”的理想，关于“任个人而排众数，摈物质而张灵明”的论述为一个“重返人性”时代的正常的人生目标作了理直气壮的张扬。“五四”作家的“问题小说”里的那些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虽然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差异很大，然而，在另外一方面，能够将自我“人生”当作问题的主体（而不是将国家政治目标当作问题的主体），这本身也足以激动人心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创造社有时标榜“为艺术”，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刚刚从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里探出头来的青年既需要“为人生”，也激动于“为艺术”。在文学作品之外，1980年代的学子还试图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隔膜，直接从中国现代作家的人生历程中寻觅现实的启迪，鲁迅的倔强，郭沫若的善变，胡适的温厚，蔡元培的包容，巴金的真诚，徐志摩的多情，萧红的坎坷……不管这些寻觅在今天看来有多么的幼稚，它们都在事实上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魅力，造就和巩固了一个时代的“专业兴趣”。

以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作为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典的意义自然就不再是西方理论的证明，重要的甚至也不是西方意义的阐释学或者其他什么“学”，而是它的确能够“打通”那些“遥远年代”的文学表现与当下人生的连接渠道，让新世纪的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自身人生问题的“影像”，而一旦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课程学习过程中发现他们的自我，发现他们人生的某种启示，那么，这些看似遥远的产品也就融入了今天，也就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而只有超越单纯的“知识”之后，一个学科的基础教育才充满了活力。

当然，在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典与当下社会人生相互联系的意义上，我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梳理依然还有它的教育价值。不过我们所谓的“历史梳理”也不是脱离文学文本的简单的现代历史讲述，那不仅容易陷入过去“以论代史”的窠臼，而且在目前的教学体制中也缺乏足够的时间来保证。我们的设想是，能不能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探索出一种“向历史提问”的方式，首先鼓励每一个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习的学子大胆提问，在学生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文学史演变）中的问题发问，特别是通过这些独立的发问逐步清除那些源自应试教育的“未经追问”的僵化的历史概念，让每一个学习者在学习中逐渐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独立思考来追问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各种现象。如果说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的渴望最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进新世纪青年学子的基础和桥梁，那么，由作品阅读而生发出来的历史的追问则是激活一个未来学人的学术潜质的契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学术长足发展的起点。前者是在情感的深处解决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困惑，而后者则可以升华为“我们究竟怎样需要中国现代文学”。

## 四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的探索和尝试，本书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它能否实现我们理想中的效果，还需要实践来加以检验。

我们的尝试还包括本书框架设计的开放性。全书各章节由“基本知识”、“代表作导读”与“延伸思考”几个基本板块构成。在这几大板块中，“代表作导读”是我们的重点，但众所周知，以一本书的有限篇幅根本不足以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经典作品，不仅大量长篇作品难以纳入，就是数量众多的短篇也无法收录。因此，这些“代表作导读”仅仅只是挂一漏万的举例而已，重要的不是这些入选的作品本身，而是通过这样的阅读方式吸引阅读者进一步走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广阔殿堂，由被动的“受教育”到主动地寻找“经典”，如果这一初衷能得以实现，我们开放式教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基本知识”部分试图简明扼要地概括相关章节最基础的知识点，这样的归纳与目前流行的文学史相比实在也是简单之至，它们当然不能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富内容，不过，在这里，我们依然想体现一种教育过程的开放性，也就是说，更多的历史细节完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补充，一是教师的课堂讲授，二是学习者

的自我阅读。我们无意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识尽力搜罗，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位出现在课堂上的讲述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心得，我们更愿意在形式上为他们的发挥预留充分的空间；我们更无意用这样的教材来替代那些各具特色的优秀文学史著作，相反，我们鼓励因为阅读本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兴趣的学习者进一步搜寻更详实的文学史论著，将本教材的学习与更多的“课外”阅读活动有机结合。

在“延伸思考”部分，我们力图提出一些文学现象的更深入的思考，如果这些思考能够打开学习者的思路，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中国新文学的先驱鲁迅有名言：“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sup>①</sup>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长河中，本书的努力仅仅是诸多尝试中的一种，如果我们的努力能够推动更多的文学史学习者关注文学本身，那么这种尝试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

<sup>①</sup>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6页。